

書品

中華書局・SHUPIN

一九九一年合訂本

書館

● 唐才子傳校箋編餘隨札

傅璇琮

● 四朝聞見錄記事糾謬（下） 徐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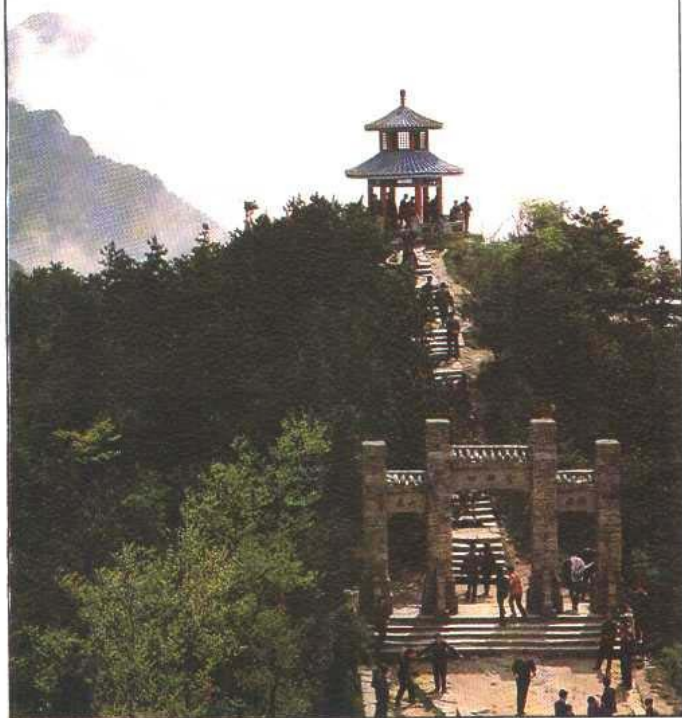
● 讀古本小說叢刊

易江

第2輯至第11輯

● 《書品》創刊五周年筆談（續）

中華書局 · SHUPIN



書

品

I

1991

莫道輕舟無客，數聲鶯啼。已玉書。賀刊創刊五周年。壬午金泰先生。

壬午金泰先生為《書品》創刊五周年而作



書品 第一期 1991年 3 月出版

主編 趙守儼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編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中華書局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國內統一刊號 CN11-1357

定價 1.50 元

揭幟曰中華言南首一家
論功高紀陸壽老暨乾嘉

書品創刊五周年題詞

羅健祖



一九九一年《書品》

一九九〇年《書品》合訂本

徵 訂 預 告

《書品》是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以評論和介紹本版圖書為主要內容的書評刊物，自一九八六年創刊，至今已出版了五年，在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支持和好評。《書品》除刊登由專家、學者撰寫的書評文章外，每期還刊出介紹國內外圖書館收藏漢籍的文章及介紹古籍常識的文章，以豐富刊物的內容，更好地為讀者服務。

《書品》服務的對象為學術界、評論界、圖書館界和古籍整理界。一九九一年，《書品》仍將以其特有的風格，繼續為各界讀者服務。一年出版四期，季末出版。每期酌收工本費1.50元，外加郵費0.30元，全年共計7.20元。

另一九九〇年《書品》合訂本定價10元，凡由我局郵購訂閱者，一律八折優惠，即收8元，外加郵費0.30元（合訂本數量有限，欲訂從速）。

凡欲訂閱的單位和個人，請與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聯繫，辦理訂閱事宜。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郵政編碼：100710。開戶銀行：北京工商銀行王府井分理處。帳號：661092~43。歡迎訂閱。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

書 品 目 錄

1991 年第一期
(總第 21 期)

- ☐《唐才子傳校箋》編餘隨札…………… 傅璇琮(2)
- ☐話說《蘇轍集》…………… 木 冉(11)
- ☐《曲品校注》評介…………… 趙伯陶(14)
- ☐海外善本小說復歸本土
——讀《古本小說叢刊》第二輯至第十一輯…………… 易 汀(21)
- ☐互為姊妹篇的古陶文研究工具書
——《古陶文彙編》和《古陶文字徵》…………… 照 榴(27)
- ☐《四朝聞見錄》記事糾謬(下)…………… 徐 規(32)
- ☐研習明史,不妨一讀
——簡說《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 謝 方(37)
- ☐顧維鈞和他的回憶錄…………… 劉德麟(40)
- ☐《書品》創刊五周年筆談(續)
祝賀《書品》創刊五周年…………… 周祖謨(44)
學術小品 小中見大
——祝《書品》創刊五周年…………… 陰法魯(45)
讀《書品》,學品書,一樂也…………… 蔡鴻生(47)
我看《書品》…………… 安平秋(48)
讀《書品》…………… [香港]劉詠聰(49)
兩點希望…………… 徐蘋芳(51)
- ☐參觀靜嘉堂文庫札記(上)…………… 傅熹年(52)
- ☐古籍小常識 勉 之:古籍的劫數…………… (58)
- ☐中華書局近期書目…………… (60)

封面攝影:陳長芬 封面設計:王增寅

封面照片:廬山含鄱口

DI 68 / 3 / 140

《唐才子傳校箋》編餘隨札

傅璇琮

《唐才子傳校箋》全書共四冊，總計約一百四十萬字。第一冊出版於1987年夏，等到第四冊出版，已經是1990年的歲暮了，其間竟佔了四個年頭，我們現在出版一部稍具規模的學術著作，真有想不到的艱辛！但我還是感到幸運，像這樣字數不算少的一部書，而且自始至末都是資料考證，別人看了可能會覺得枯燥無味，或如有些人認為的不過屬於低層次的格局，也總算經歷了近些年來出版業所受到的市場經濟的衝擊，終於印了出來。撫摸這四冊書，我在感到相當疲乏之餘，也略為舒坦地鬆了一口氣，心中充滿着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激之情，——既感激數年來與我合作的二十幾位學術上的知友，也感激印刷廠那些無間寒暑，終日托着鉛盤，站着一個字一個字撿而獎金又所得無幾的工人師傅。我做過三十餘年的編輯工作，而且現在還在做着，或許正因此比學校或研究機構的同行們更懂得一本書出來是多麼的不易，有多少人，包括工人師傅、校對、編輯人員，默默地為它付出辛勞；也許正因此，我總是感到，一個人，像我們那樣，能力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總應該寫出或編出對別人多少有用的書，如同木匠做成一隻碗櫃，泥瓦匠砌成一間廚房，總算是盡自己的一點本份。

“前言”中說，這本書“是想在專題著作和古籍整理中探求如何使個人專長和集體協作能有效的配合，同時也包含有一個這樣的希望，就是不滿足於傳統意義上的箋證，而是想通過現在那樣的箋證的方式，科學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蹟研究的線索，希望這本書能作為有唐一代詩人事迹的材料庫”。應該說，這樣的設想是在籌備的過程中逐步明確的，而在最初，我之所以立志於想搞《唐才

子傳》的整理，無寧說是感情的因素多於理智的因素。

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勞動，有一天聽到消息，說是馬茂元先生本來是要作《唐才子傳箋證》的，已作了一部分，“文革”開始，他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悲憤之情不能抑制，一氣之下就把《箋證》的手稿都燒了。茂元先生是我欽敬的唐詩學前輩，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正當他的中年，以他對古典文學的深厚修養，來為《唐才子傳》作箋證，一定是會很精彩的。可惜一場浩劫，使馬先生這一善良願望與純正的學術志尚成為終生之恨。八十年代初，他把“文革”前的舊作結成《晚照樓論文集》出版，“後記”中說：“爲了替計劃中撰寫的一部斷代分體文學史——《唐詩史》做好準備，我先行着手編著《唐才子傳箋證》。企圖借辛氏之書引出線索，旁徵博採，辨析異同，將有關唐代詩人的傳記資料，全面地系統地加以考訂，從而對唐詩風格流派之形成及其傳統繼承關係，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經過兩年時間，已寫出初稿約二分之一。收在這本集子裏的《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唐詩札叢》，就是它的副產品。”可見馬先生對唐詩的研究有一通盤的考慮，而為《唐才子傳》作箋證，則是他整體計劃中重要的一環。這裏提到的《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與我還有一段姻緣。這篇文章是“文革”前馬先生寄交給《文史》的，還來不及刊出，運動開始，這篇文章隨同《文史》的其他文稿都積壓在那時的《新建設》編輯部（當時《文史》是由《新建設》與中華書局合編）。“四人幫”倒台後，中華書局積極謀劃恢復《文史》的出版，在籌建初期，我與現在已調至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任研究員的吳樹平同志到原《新建設》編輯部一間蜘蛛結塵封的房間清理舊稿，在一大堆亂紙中發現馬先生這篇文稿。當時我也正在搞唐代詩人的考索，一見此文，欣慨交加，遂一邊函告馬先生，一邊就在剛復刊的《文史》上刊出。我自己覺得這只不過出於職業的道德心，履行作為一個編輯的職責，却想不到馬先生又寫信給我，又託人帶話，說這篇文章如放在他家裏，“文革”中肯定也被毀了，而且他自己一時竟也想不起來，對我再三表示感謝。

咸寧地處楚澤，廣漠的平野常見大潮返照落日的奇彩，但茂元

先生焚稿的消息使我在這屈子行吟的故土總仿佛看到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那時身在幹校，命運如何，前途誰託，絲毫未能知曉，但我却萌發搞《唐才子傳》的強烈的衝動。大約1980、1981年間，我到上海出差，專程去看望茂元先生，他已卧病在床。後來他的《晚照樓論文集》印出，特地寄給我，還附一信，中謂：“前大旆來滬，禮辱先施，幸接光儀，至慰渴念。恨在病中，不克回訪。……寄奉拙著一冊，敬乞指教。周振甫、程毅中兩兄處，乞代致鄙忱。另有一事相煩：內有奉夏老一冊，亦請便中代陳。”《晚照樓論文集》的書名，是夏承燾先生題簽的，因此茂元先生叫我代送。這幾年茂元先生身體愈益衰弱，這使我更從感情上覺得有一種無可推卸的責任，把前輩學者的未竟之志在我們這一代中完成。

促成我搞這部書的，還另有一個感情上的因素，即是日本學者所已作出的成績的挑戰。1972年8月，日本出版了布目潮瀨和中村喬兩位先生的《唐才子傳之研究》。布目潮瀨生於1919年，中村喬生於1936年。他們編著此書，可以代表日本老一代學者與中年一代學者研究的集結。他們的工作分校勘、譯文、注、資料探原四項。按《唐才子傳》十卷，明初編《永樂大典》時尚為完帙，曾全部收入該書“傳”字韻內。但此後《大典》續有散失，至清乾隆編《四庫全書》，《大典》“傳”字韻各卷均佚，十卷單刻本此前在國內也久已失傳。四庫館臣只得從《大典》殘存各卷雜引《唐才子傳》處“隨條摭拾，裒輯編次”，成書八卷，只搜得二百四十三人，附傳四十四人，比起原書立專傳者二百七十八人，附傳一百二十人來，少四分之一，只是一個斷簡零篇的輯佚本。但日本却保存有元代刊行的十卷足本，這是目前所見最好的版本。日人曾先後據以刊刻了好幾種本子，較好的有日本南北朝後半頃（十四世紀後期，約當我國明初洪武年間）刊行的五山版，現有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內閣文庫藏本。另有日本正保四年（公元1647）上村二郎衛門刊本，與享和二年（公元1802）的《佚存叢書》本。《佚存》本傳入中國後，中國學者曾以《四庫》的八卷本與之對校，刊刻過幾種本子。但由於日本保存的版本最早，刊刻較多，因此日本學者有優越的客觀條件，所作《唐才子

傳》版本的考證，大多富有參考價值。雖然他們利用中國學者的成果和中國的文獻記載還不够充分，但從已有的成績看，已居領先地位。布目潮瀨兩位的另一工作“資料探源”，是見出日本學者的工力的。他們利用兩《唐書》、《唐詩紀事》、晁陳二志，以及某些詩文別集，查考《唐才子傳》記述的材料出處，應當說所用材料大多是常見的，但有一些是需要輾轉勾稽才能查出。從八十年代中期我國唐代文學研究的水平看，這樣一種的“資料探源”，我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們的力量分散，還未能把研究力量集中起來，因此使得關於《唐才子傳》的研究，在此以前，日本學者一直走在前列。《唐才子傳》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部名著，作為本國的文化遺產，我們中國的學者把它整理出高水平的本子，應該說是一種義務。一種學術上的民族自尊心，使我感到要在短時期內拿出在國際上也能得到承認的著作。

上面提到的馬茂元先生作為《箋證》的副產品的兩篇文章，一篇到王之渙，一篇到陳子昂，可見馬先生在開初兩年內大約作到盛唐前期。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對於大曆以前摸過較多的史料，中後期，除了環繞牛李黨爭和李商隱之外，大部分還沒有下過工夫。當時我與一些友人商議，箋證的工作，大致包括這樣三項：一是探索材料出處，二是糾正史實錯誤，三是補考原書未備的重要事迹。考慮到書中所收作家有近四百人之多，按照上述要求，那無異是對唐五代詩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證。辛文房以一西域人，為一代詩人寫傳，確有非凡的氣魄，他寫這部書，應當說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那時他所能看到的材料還不少，唐宋人所作的幾種登科記，還有一部分流傳於世，他當能看到，因此徐松作《登科記考》，關於進士登第年就把《唐才子傳》作為立論的依據（此點請參閱我另一部書《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一章《材料叙說：唐登科記考索》）。但辛氏寫這部書，正如我在《校箋》的“前言”中所說，其主旨似乎在因人而品詩，重點是標其詩格，而不在考其行迹。因此他雖然也搜輯了不少史料，但在排比史料與寫成文字時，却十分隨意，疏誤隨處可見。因此我在構想整理方案時，逐步明確這樣的三點：

第一，徹底清理本書的材料來源，從史源學的角度，要求做到兩點：一是查考辛氏所用材料的最早出處，以及這些材料曾經經歷過怎樣的流傳過程，其間有無變異；二是考核材料的正訛真偽，從生平事蹟的整體考察，來確定哪些材料經過檢驗是可以成立的，哪些是有問題的。因為在此之前，我看到我們的一些研究者，不去查核唐宋時的史料，而僅引用《唐才子傳》，不加覆核，就往往把它的錯誤記載作為論證的依據。我們希望通過材料清理工作，能够改正這種情況。

第二，以此為線索，補考出辛氏未加記載的重要事蹟，作為到目前為止的這將近四百位詩人生平研究的一次集結。我認為，從作家傳記的角度來衡量《唐才子傳》，辛氏的貢獻畢竟是極有限的，記述不但多有錯誤，而且過於簡略。如果我們只做材料考源與辨誤的工作，化了不少力氣，所得有限，畢竟太可惜。因此我想，不妨把《唐才子傳》只作為架子，利用和發揮我們的學術潛力，借此來做唐代詩人生平考證的工作。當然限於箋證的體例，我們也不能鋪開來做，成為一篇篇作家考的專題論文。我們可以把考證濃縮，提供基本的材料線索和概要的考析過程，使得研究者可以此為起點，作進一步的開拓與深入，這就是“前言”中所說的，“希望本書能作為有唐一代詩人事蹟的材料庫，使書中的箋證既是現有研究的成果，又是無限的學術進程中一個新的起跑點”。

第三，以上兩點的工作要求，使得作這部書的箋證具有作家生平考證專著的性質，而所考又上起初唐，下至五代末，時間跨度大，人數眾多。一個人，窮畢生之力，或許能够做成這樣一部書，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畢竟不能這樣的等待，況且一個人的修養為各種條件所限，也不大可能對所涉及的每位作家都有很深的研究。這些年來唐代文學研究的進展極為迅速，我們完全可以集合有關專家，分工合作，以集體之力來承擔起這一工程。而我或許因工作關係，與不少研究者多有交往，比較熟悉他們的學術優長與治學特點，因此我不自揆地擔任起創議，組稿，協調關係，統一體例，以及最後發稿等工作。有幾位本來在某一方面已有專著，如郁賢皓同志之於李

白，周勳初同志之於高適，陳鐵民同志之於王、孟等盛唐諸家，等等，我則請他們擔任各自專長的部分。有的則是在我的《唐代詩人叢考》出來後，曾與我商榷，糾正我的錯誤或補充我的不足的，這次就請他們撰寫有關詩人的箋證。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同志曾寫過《關於顧況生平的若干問題》（《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補正我《顧況考》一文的好幾處誤失。現在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蔣寅同志，在他做研究生期間，曾以戴叔倫為題寫作論文，後又寫成《戴叔倫作品考述》等文發表，對我關於戴叔倫後期任撫州刺史時的考述，多所匡正。安徽大學中文系周養敢同志有《張繼詩考辨》（《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三期），對我的《張繼考》也多有補充。不管他們都比我年輕，像蔣寅同志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我認為他們就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也就商請他們做有關詩人的箋證。中晚唐及五代，一個作家的事蹟往往與其他作家相連，又由於那一時期史料的混雜，事蹟考辨工作往往要幾個作家同時進行。這樣我就將中晚唐部分成卷地請徐州師院吳汝煜、蘇州大學吳企明、廣西民族學院梁超然等同志擔任，唐末五代則請廈門大學周祖譐同志與他原來的研究生而現在在唐詩學界已卓有名聲的吳在慶、賈晉華兩位同志擔任。

這種以個人專長與集體協作有效配合的方式，確實收到明顯的效果。第一冊出來後，北京大學的王瑤先生寫信給我，稱贊此書“羅致各方力量，合力完成，確係功德無量之舉”，並說這種組織方式與體例安排“富時代特色”。復旦大學王運熙先生來信說，這樣做“為唐詩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書品》1988年第2期刊出任爾同志的書評《數據庫·信息網·方法論》，還以周勳初同志所作高適傳箋證為例，特別提出，由於各篇由各有關專家執筆，所作的箋證還起到方法論的示範作用。

應當着重提出的是，全書的校勘由徐州師院的孫映逵同志一人擔任，做得非常精細。映逵同志原有《唐才子傳》的校注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後由於我的請求，把他的校勘成果全部投入現在的這部書中。他對《唐才子傳》的版本源流瞭解得十分清楚，校記本已

作成，後來我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的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內閣文庫本（即五山本）復印一份給他，他又不憚煩地重校了一遍。現在這個《校箋》本，採用黎庶昌珂羅版影日本所藏元刊十卷本爲底本，而以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書》本、《四庫》本、三間本、《指海》本相校。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說，“由於採擇的底本較好，錯字較少，因此校勘的文字並不多，但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這字數不多的校勘記是包含校者大量的勞動的”。我認爲，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掌握理論當然是不可少的，吸收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們還應立足於我們自己的學術土壤，要有傳統的治學方法的訓練，這是一種基本功。校勘就是這種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怕是很不爲人所看重的；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顧的樣子。映達同志所作的這一校勘，使這一部書在文字方面有一個扎實的依據，我相信，校記中體現的淳樸的學風定會有積極的反響。

我還要說的是，我與合作的這些位學者，在工作進行中，及在工作完成以後，友誼不斷增進。顧炎武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的話，可能是有激而發的。在當今的學術潮流中，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而又互相尊重，是十分必要的。孫映達同志後來又獨立完成《唐才子傳校注》一書，將由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他命我作序，我在序中表達了我對他那種樸實敦厚、腳踏實地的學風的欽敬。吳汝煜同志由作中唐作家的箋證，進而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以及與胡可先同志合作編寫《全唐詩人名考》，我都應邀爲兩書寫了序。吳在慶同志繼續以杜牧爲中心展開研究，賈晉華同志因着力於本書第十卷的箋證，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料，擬進一步寫作五代文學史的專著，他們兩位並已與我合作，搞晚唐五代文學編年。可見，搞一個較大的項目，是能够帶動研究的一定開展的。

現在全書四冊已經出齊，我誠懇地等待着讀者的批評。這部書既是期望作一個唐代詩人的材料庫，當然希望材料能不斷得到補充和更正。就現在所知，已有幾處可以補正。如卷一張子容傳：“後值離亂，流寓江表。嘗送內兄李錄事歸故里云：‘十年多艱與君同，

幾處移家逐轉蓬。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行人杳杳看西日，歸馬蕭蕭向北風。漢水楚雲千萬里，天涯此別恨無窮。’”現在箋證中說：“按《全唐詩》張子容名下無此詩，當係失收。觀‘十年多難’句，則子容安史亂平後尚在世。”實則《全唐詩》卷一五一載此，爲劉長卿詩，題《送李錄事兄歸襄郡》，李錄事即李穆。此點周本淳先生於數年前出版的《唐才子傳校注》已糾正辛氏之誤，並疑“後值亂離”以下皆劉長卿事。又如卷五張登傳：“嘗晚春乘輕車出南薰門，抵暮指宜春門入，關吏捧版請書官位，登醉題曰：‘閑游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老翁無品秩，三曾身到鳳池來。’其窘迫如此。”箋證中說此段文字未詳所本，並指出這與前面所已引用的權德輿《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權載之文集》卷三三）所載不合。周勳初同志在其主編的《唐詩大詞典》附錄《唐詩文獻綜述》中曾指出辛氏此誤，說：“查《詩話總龜》卷十七引《古今詩話》，知此實爲宋人張士遜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四：‘（康定元年）五月壬戌，宰相張士遜拜太傅、鄧國公，致仕’，‘士遜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凡之入相，僅三年。’辛文房所看到的，當是《古今詩話》的原文，該處正作張鄧公，而偶有殘奪，訛作登字，辛氏遽而錄入，遂成大錯。”按勳初同志所考是。此亦見《湘山野錄》，著者文瑩爲熙寧時人，其書似稍早於《古今詩話》。厲鶚《宋詩紀事》亦載作張士遜詩。此事吳汝煜同志亦曾寫信告我，希望我在校樣上改正，但時已付型，來不及改，對已故去的汝煜同志，我甚感遺憾。

書中材料的補充是大有可爲的。如卷一鄭虔傳，就可補千唐詠齋所藏鄭虔的《大唐故汾州崇儒府折衝榮陽鄭府君（仁穎）墓誌銘》，此爲《全唐文》所未載，據此並可考見鄭虔於開元十五年曾任左監門錄事參軍。浙江台州石門縣還留存有《石門鄭氏宗譜》，載有鄭虔的生卒年。另據復旦大學陳尚君同志見告，晚唐時人路公望的《北戶錄》及所附注文，有鄭虔佚文。我後查閱此書，果然發見標明鄭公虔曰等文字七、八處，雖屬殘句，仍極可貴。

另外，按照體例，箋證的文字凡是引用現有成果的，須注明出處。卷四王季友傳，其中說：“家貧賣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這是

本杜甫爲王季友所寫的《可歎》詩“貧窮老瘦家賣屨，好事就之爲携酒”，應當說有所據。歷來也都據杜甫此詩來考見王季友的生平。我曾看到台灣東海大學教授楊承祖先生發表於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第一分（1983年）之《杜詩用事後人誤爲史實例》一文，文中指出杜詩這裏並非實寫，而是暗用謝承《後漢書·劉勤傳》事。我覺得所考新奇而可信，就舉以告作此箋證的儲仲君同志，仲君同志更進一步有所考核，但因那時海峽兩岸交流尚有很大的阻隔，因此我在統稿時未注明楊承祖先生的文章。去冬在南京大學參加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楊先生也來了，彼此切磋學問，一見如故，我就把此事告訴了楊先生，他聽了甚爲欣然。我想，以後重印時是應當把這點補上的。同時，台灣也有好幾位治唐代文學很有成就的學者，我希望他們能根據這些年來台灣的研究成果，來補正本書的不足，更好地開展海峽兩岸學術文化的交流。

一九九一年元月初旬於北京西郊六里橋寓所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全部出版

由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選，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日前已全部出版。全書共精選拓本 20000 餘種，所收拓本多爲原大，如實地再現了各種石刻的原貌，行款字數、損壞存佚、神韻風貌。每種拓本均附有簡短說明並注有拓本的高廣尺寸、拓本的真偽、流傳經過、收藏概況等等，對於研究者是一部極好的參考資料。全書共分爲九部分，即：“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兩宋”、“遼金西夏”、“元代”、“明代”、“清代”、“中華民國”。綿延兩千餘年，如實地記載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的發展。做爲一種特殊的歷史資料，其價值之高，可用性之廣，毋庸置疑。

全書共 100 冊，8 開本精裝，定價 24000 元，索引兩冊將於今年五月出版，定價 500 元。該書由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經銷。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郵政編碼 100710。聯繫人：黃英。

注：徵訂單內容簡介函索即寄。

話說 《蘇轍集》

木冉

蘇轍(1039—1112)字子由,晚號穎濱遺老,眉山(在今四川省)人。北宋文學家,與父蘇洵、兄蘇軾齊名,世稱“三蘇”。

蘇轍十九歲即登進士科,官至尚書右丞、拜門下侍郎。他生活在積貧積弱、危機四伏的北宋中晚期,有識之士紛紛主張變法革新。然而無休無止的激烈黨爭,使書生氣十足的蘇轍難以建功立業。數十年宦海生涯中,他幾經浮沉,飽嘗了人間的酸甜苦辣。這一切又凝結成千餘篇文章和近二千首詩,釐為《樂城集》五十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樂城三集》十卷、《樂城應詔集》十二卷。明人茅坤評曰:“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疏宕嫺娜處

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諸家所及。”(見《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定公《歷代論》評語)其兄蘇軾亦如是說:“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見《蘇軾文集》卷四十九《答張文潛書》)這並非兄弟二人互相標榜,細審《樂城》諸集,可知大蘇之言不謬也。明、清兩朝,蘇轍散文與其父兄一樣躋身於“唐宋八大家”之林,被奉為典範作品,在文學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

《樂城》諸集多為蘇轍晚年手定。最早有蜀本、建安本傳世,頗多舛謬,覽者病之。南宋淳熙間,蘇轍曾孫蘇詡以家集請人校讎,鋟版於筠州;開禧間蘇轍四世孫蘇森主持重印。遺憾的是此種進呈宋孝宗御覽的善本,未能完整地流傳至今。有元一代不曾翻刻《樂城集》。直到明嘉靖二十年(1541),蜀王朱讓栩採用內江張潮家藏善本《樂城集》八十四卷(含後集、三集),命長史高鵬、教授舒文明校正鋟梓,這就是刻印精美的蜀藩本;其後不久又有銅活字本,係據蜀藩本重排,疏漏較多。以上諸本均缺《應詔集》。只有明萬曆間經

王執禮、顧天叙校定的“清夢軒刊本”，除增補《應詔集》策論外，正集奏議亦比蜀藩本多三十七篇，堪稱通行足本。清道光間眉山《三蘇文集》本所收蘇轍詩文九十四卷，實為“清夢軒刊本”的改編本（調整了卷數及編次）。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據明活字本影印《樂城集》，編入《四部叢刊》，其底本的選擇及印製質量未能盡如人意。近百年來蘇轍文集無善本刊行，有關的文學史專著很少論及蘇轍，專門研究穎濱遺老的學術論文更是鳳毛麟角。這樣對待一位久負盛名的大散文家，似乎有失公允；而研究上的空白，殆因蘇轍文集長期未得到重新整理，因而流傳漸少。

為此，中華書局早在十餘年前就約請北京大學陳宏天老師着手校理《樂城集》，這項工作後來得到高秀芳老師的全力支持與密切合作。在周密調查的基礎上，他們首先理清了《樂城集》的傳刻源流，糾正了前人誤將明活字本當作蜀藩本的陰錯陽差，進而精心收集並複製了宋版蘇轍文集的若干珍貴資料。最後慎重選定明萬曆間“清夢軒刊本”為底本，以今所知見的三部宋刊殘帙及上述有代表性的明、清各刊本為主要校本，並參酌利用其它有關資料進行彙校。比異同，勘是非，訂訛補缺，耗時八載，整理出數百條校勘記，附於各篇詩文後。遵循“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慣例，全部蘇轍詩文及有關附錄均加新式標點，長篇散文酌情分段，以便閱讀。整理者還在異體字的校改劃一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全書採用規範化的繁體字，淘汰了最令初學者煩惱的大量異體字、俗體字、避諱缺筆字及誤刊之字，只是保留了通假字。這就為一般讀者使用該書，掃清了某些文字障礙。

整理者對待《樂城集》的點校工作是相當謹慎和認真的。遇到某些專門問題，如北宋兵制、水利建設、佛學思想等，整理者虛心向專家學者請教，蘇轍的某些專業性很强的詩文，曾呈請知名教授審讀把關。有時為一條校記，一個標點，整理者也斟酌再三，避免偏頗和武斷。嚴謹的學風確保了《蘇轍集》在點校質量上達到新的高度。

本書附錄所收歷代蘇轍集序跋提要，以及宋人孫汝聽所編《蘇穎濱年表》，均係全面研究蘇轍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按四角號碼